

● 中国语言文学

# 苏雪林与武汉大学及其屈赋研究述略

王庆元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庆元(1941-),男,河北晋县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摘要] 苏雪林是集创作与学术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她在武汉大学执教18年,其屈赋研究肇端于武大,但真正进展和完成是在台湾。她的《屈赋新探》是学术、文坛的一朵奇葩。她研究楚辞走了一条与同时代前辈学者不同的路线。用“域外文化”解释屈原作品,是苏先生的独得之秘。她发现“世界文化同出一源”,重新构建屈赋中的诸神世界,并找出了楚辞、屈赋研究的新路线,这是我们给苏先生学术研究贡献的定位。苏先生对屈赋的研究成就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关键词] 苏雪林;武汉大学;域外文化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2-0243-08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岛与大陆阻隔了近半个世纪,台湾成功大学苏雪林教授这位集创作与学术于一身的人物,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中被“淡化”了,大陆新一代人甚至她曾经执教18年的武汉大学对她也非常生疏了。然而,历史的脚步终究是向前的,任何天然和人为的屏障,不能永远阻断海峡两岸龙的子孙的联系。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这位大师级的人物及她的煌煌巨著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在这些著作中,苏自己最为宝贵的是她的洋洋160万言的《屈赋新探》,她在90余岁写的《自传》的“自序”一文中,念念不忘她的屈赋研究:“我这研究耗费我30余年心血,成书以后,人多视为野狐外道,非正法眼藏,我独视为性命一般,非常宝贵。现世虽无知者,我将求知音于50年、100年以后。即五百年以后仍无人赏识,那也不妨,‘文章千古事’,只须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sup>[1]</sup>(第2页)这段话,是苏梅女士的心声,她对自己的著作既充满无比自信,也流露了一种悲观的估计。苏雪林教授已于今年离开了人世,我们却相信她的著作不管是散文创作也好,还是学术著作也好,必不会长久湮没无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赏和研究,它

们将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人共同宝爱的文化遗产。

苏先生从1931年起曾在武大生活了18年,她的《屈赋新探》也是在武大任教时开始撰写的。惜余生也晚,未能亲聆其教诲。下文系据有关资料撰写,即从武大所在地珞珈山叙起。

## 一、苏雪林与珞珈山的因缘

1998年苏雪林教授终于圆了她的一个梦,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故乡——安徽太平县。但她也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未能完成她长久的宿愿——到武昌珞珈山去看看。在台湾时她曾写过一篇散文《怀珞珈》,文中这样说:“珞珈山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所在地。自从民国20年,我到武大教书以后,便在这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始我一段极有意味的生涯。那银墙碧瓦,焕若帝王之居的建筑;那清波滢滢,一望无际的东湖;那夹着蜿蜒马路,一碧参天的法国梧桐;那满山满岭,郁如浓黛的松林;那亭榭参差,繁花如锦的校园,使得珞珈成为武汉三镇风景最美之区。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如织,都自那烦嚣杂乱的都市,涌向这市外仙源,抖落十斛襟尘,求

得几小时灵魂解放之乐。”

苏雪林一生二赴法邦,曾寄迹世界闻名的花都——巴黎。然而,她认为着意打扮起来的巴黎铁塔、凯旋门、圣母院、圣心堂及一切有名建筑的夜景,无论如何也不及武汉大学夜景之美。这是因为:“巴黎各建筑都笼罩在十丈软红之中,先就有一股尘俗之气,武大则屹立在湖山佳处,背景是那么高旷清远,灯火光中,愈觉玲珑缥缈,看起来自然给人一种神仙楼阁之想了。”

苏雪林回味中认为珞珈风景最诱人的当然是那有名的东湖。她说:“杭州西湖,我嫌她太小,水又太浊,东湖要比她广阔几倍。水是彻底的清。朝霞、夕晖,光彩变化,月夜则涟漪闪烁,银波万顷,有海洋的意味。”“游泳时,浮拍波面,或潜身水底,各有妙趣。”“居住珞珈的人固然要把每天一半光阴消磨在东湖里,三镇居民也成群结队而至,在那柔美湖波里,寻觅祛暑的良方。”在未读到苏先生此文之前,大陆的读者,尤其是生活在珞珈山的师生都曾读过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洪波曲》中所描写的珞珈山:“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淡淼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 20 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对郭老的说法,大家普遍给予认同。如今读到苏先生的散文。大家感受则更加的亲切,且获得一种阅读美文的享受。苏先生在抗战 8 年中曾随校迁往四川,虽住在风景优美的乐山,仍然老是怀念着珞珈。她说:“珞珈山光水色常常萦绕于我的魂梦之中,不是乌尤和大渡的秀色所能冲得淡的。”在抗战胜利回到武汉,当风掣而进的汽车过了洪山,武汉大学的校舍已巍然在望时,她写道:“我们全体同仁,不禁都自车中起立瞻眺,像孩子似的发出一阵欢呼。太太们中间甚有喜极而涕者。”这种心情,作为曾在珞珈生活过的人是完全能够理解并有同感的。

1949 年苏先生离开武汉,告别珞珈,到了夫家所在的上海住了 3 个月,她仍流露了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武汉大学或有再回之日吧!”遗憾的是她此一离去,辗转香港、法国,最后定居台湾,在台又执教于各高校近 20 年。然后退休又生活了 20 多年,虽然活到 104 岁的高龄可再也未能回到武大。

如今我们可以告慰苏先生的是,作为武汉一颗明珠的珞珈山和著名学府武汉大学,今天已度过了建校 106 周年。经过了苏先生离去半个世纪后,武大

的环境已建设得更加优美。这里,每年都有本科生及研究生 2000 多名学子进校学习,50 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之才。两岸隔绝 40 年解冻以后,它也是最早与台湾高校交流、沟通的大学。中文、哲学、历史各系都与台湾高校多次共同举办过学术研讨会。当然,珞珈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于环境污染,东湖的水再也没有当年那么澄清见底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武大师生已很难浮拍于碧波之上,享受潜于水中的乐趣。但我们相信她将来一定会变得更美,更好。

## 二、武汉大学与其屈赋研究的关系

1931 年下半年苏雪林在安徽大学教了 1 年以后,接到武汉大学的聘书,于是到了由城内新迁武昌城外之珞珈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新成立的武汉大学其地位略逊于北大、清华和浙大,是国民党出重资新建的一所名牌大学,设文、法、理、工 4 院。校长是王世杰先生。开办时文学院有 3 系:中文、英文、历史。文学院早期院长是闻一多先生。苏进校时已换成陈源先生(字通伯)。苏来校后,首先感到武大中文系是个古典文学的大本营,名师云集,阵容整齐。文学院院长刘永济是个旧式楚辞专家。系主任刘博平(名贻)则是国学大师黄侃的最早及门弟子,《说文》专家。还有黄侃的侄儿黄焯、陈寅恪之弟陈登恪、王国维弟子高亨及诗学专家徐天闵,古文基础湛深的朱东润等。相形之下苏感到当年中文系对白话文学是不重视的(朱东润曾回忆说,刘先生(博平)有句名言:“白话不算是文学”)。而苏雪林先生来校前主要作品(除《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证》外),如《绿天》、《棘心》、《蠹鱼生活》都是白话散文、小说。苏在《自传》中说:“中文系资深教授都是古典文学的保守者,哪里看得上我这个仅能用引车卖浆文体写文章的。”<sup>[1]</sup>(第 117 页)这话不假,因为同样以写白话小说成名的叶圣陶先生,即被老先生们认为“不通”,而不得不辞职离校。苏先生不仅写白话文,而且学历、师承方面也嫌不够(北京女高师国文系肄业 2 年,后至法国中法学院学习了几年法文)。但她在武大教中国文学史课程长达 18 年,并未实际受到排挤。缘故何在呢?在《自传》中苏披露了个中肯綮:首先由于苏本人异常用功、努力:“我在武大教学之余,还偷暇写作。曾为商务印书馆写了《唐诗概论》一本,《辽金元文学》一小册子。……我把《唐诗概论》赠上我文学史的学生每人 1 册。有女生杨某乃教诗学的徐天闵教授之甥女,她得我书后呈徐教授阅读,徐读后颇为讶异,对我的脸色便有些不同。似是想不到那个只能以

引车卖浆者言写些乱七八糟的苏雪林,也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sup>[1]</sup>(第88页)文学院院长刘永济见了也说:“我看你写的那本《唐诗概论》倒还不错。”尤其是苏写了关于屈赋的文字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后,这位楚辞专家,更加刮目相看:“见了我不但大有愧色,而且那种茫然自失、嗒然若丧的神态也叫人于心不忍。”

另外,苏蒙受老校长王世杰先生多方关怀爱护。“记得我初到武大第1年,在黑板上写了个别字,又读了几个讹音,被一个被我打分数太低,怀恨我的学生捉住把柄,向系主任告发。年终系会考绩定去留,几个资深教授都投我反对票,院长虽偏袒我,但他主张开口奶须吃得好,也想投我反对票。他这1票若投下,则反对过了半数,我只好卷铺盖走路了。幸亏王世杰校长起立发言,他说他‘曾在《现代评论》及《武大季刊》读过苏讲师的文章,苏讲师并非是个没有学问的人,她的古书读的也不少,而且她在书中发现问题,加以新颖的解释,胜过徒读万卷书、不知如何运用的两脚书橱者十倍,至于偶尔写个别字,读几个讹音,则为自修成功者所难免,慢慢的她自会改正,并不会贻误学生,可请放心。我主张应予以续聘’。校长既为此说,大家当然不能再反对了。”<sup>[1]</sup>(第88页)这里谈的《现代评论》发表的文章即指《屈原与河神祭典的关系》(后改题为《九歌中人神恋爱的问题》)。此文发表后,楚辞学家陆侃如在其《中国诗史》中曾给以“其说亦通”的考语,而闻一多先生则在清华大学讲授楚辞时赞为“颇为有理”,虽非楚辞行家的陈通伯院长也对苏说:“我觉得你对屈赋很有研究,而且见解新颖,比那些旧式楚辞学家强得多,即比现代新楚辞学家游国恩、陆侃如也无多让。”<sup>[1]</sup>(第83页)王校长说苏善长在书中发现问题,加以新颖的解释的话,殆亦指此。

然而正如苏说:“同系老先生对我的歧视如故。”“抗战末期,我忽然无意间得到解决屈赋的线索,……写了几篇文章,如《月兔源流考》、《国殇乃无头战神说》、《山鬼与希腊酒神》,想刊《武大季刊》,刘先生便横加压抑不让其面世。”<sup>[1]</sup>(第85页)其中《国殇乃无头战神说》一文,被压了1年,苏只好索回。苏说:“我的楚辞研究,他们(指刘等人)一向视为野狐外道……是连看都不看的,我也只好藏拙。”<sup>[1]</sup>(第117页)

苏先生的屈赋研究,何以被有些人视为野狐外道?她的楚辞研究走的什么路线?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在苏先生《屈赋新探》巨著4大册,均已出版,其中如《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近年并且再版(台湾文

津出版社再版),可以由有关方面的专家来探究一番,而最后作出结论的。

苏先生直率地说直到她离开武大(1949年),虽然写了几篇屈赋的研究文章,但“对整个屈赋的内容仍未窥其奥秘”<sup>[1]</sup>(第85页),文字亦苦于无发表之地。可以说,苏雪林的屈赋研究在武大只是开了个端,而真正的进展和完成,是到台湾以后的事。

### 三、对苏雪林屈赋研究成就的评述

苏雪林先生说:“屈赋不仅是文学的奇珍,也是中国文化史的瑰宝。”屈原“壁立万仞,一空依傍,陶熔万家、自铸伟词,写出了《离骚》、《天问》等20几篇韵文,不仅文采瑰丽,情感深厚,超越以前作品,内容之富,更像一座蕴藏极厚的宝藏。”她又指出:“屈原作品虽仅20余篇,但历来评论和探讨者却非常之多,成了一种很大的学问。这固由屈原本本人忠贞芳洁,人格超卓;他的作品也篇篇瑰玮,光彩照人,其境探之愈深,其味炙之愈出,故此极得读者的爱赏,爱赏之不已,自然又要加以钻研。”“较早的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班固、贾逵、马融等《离骚章句》及《离骚注》今已难于得见,我们现在所有的,仅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而已。唐、宋、明、清诸代学者对于屈赋的兴趣,日趋浓厚,著述渐多。五四以后,楚辞学者尤彬彬辈出,他们已知采用精密的科学方法来分析屈赋的内容,成绩远比前人为进步。”<sup>[2]</sup>(第1页)

苏先生以“五四”为线,把研究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是合理的。“五四”以前的楚辞研究主要是传统的方法,即以考据、义理、辞章为主要研究范围。“五四”以后研究则出现了新局面、新方法。除了仍然继承传统治学方法外,所谓新方法即将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美学、比较文学引入研究领域。对后者的成绩苏先生充分予以肯定,因为它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和进步。

苏先生自己也是遵循后一路线开展研究工作的。台湾唐亦男教授说:“她研究屈赋,得到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而这一方法是从搜讨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之后无意中得来的。”<sup>[3]</sup>(第415页)苏先生自己也说:“至于我,研究屈赋竟发现了一条新的路线,这路线,便是屈赋内容必非故纸堆所能解决,必须搜讨古代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而后可。我这个路线的发现完全是于无意中得来的。”<sup>[4]</sup>(第3页)关于具体发现过程,苏先生在她的《屈赋新探》各书序言中已屡屡言之,故不复叙。本文拟探讨的是如下问题:第一,苏先生研究楚辞何以走

了与她同时代的许多前辈学者不同的路线?第二,这一路线是否能够立足?即有无理论依据?苏先生的论证是否可靠、可信?第三,苏先生研究屈赋的成就的意义和值得今天借鉴学习的地方。下面分别言之:

研究屈赋,传统的方法主要是有关名物制度,字、句、章、义的注释、训诂、考订及义理阐说,历代楚辞家耗其一生心血,所作笺疏考证工作成绩固不能否定。今人如不依靠从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开始的各家注本的帮助,读懂都很困难,何况研究?然而历史进入现代尤其 20 世纪以来,大量的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笺释注疏上,学术研究工作是没有办法进展的。五四以来,学人们纷纷用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文化、哲学、民俗、神话等角度去研究楚辞,构成楚辞研究的主流,这是时代赋予的,苏雪林先生走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新路线也是时代潮流促成的。这是其一。其二,从苏雪林本人的学养条件来看,她不具备旧派楚辞学家对古代典籍的深厚功底,如仍照旧派学者如刘永济等的路线走下去,很难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阅其《自传》,我们发现苏具有旧派学者不具备的优越条件:(1)留学法国学习法文约 4 年,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熏陶,对外来文化有亲身了解,如她后来研究屈赋中创世纪神话,即利用了法文本《旧约》。(2)有较多宗教知识。苏说:“大约因为我自己本有宗教信仰的缘故吧,对于世界宗教及神话及其性质相类的书籍,每喜注意,关于这一类的知识,我比别的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要多一点,因此我在屈赋研究上便占了便宜(按:苏认为屈原作品有许多外来哲学、宗教、神话成分)。”<sup>[5]</sup>(第 467 页)(3)熟悉世界文化史知识。她在安徽大学 1 年,教的是世界文化史。因教课所需,不仅借阅了世界文化史书籍自行揣摩,而且将在法国习艺术时买的几部艺术史,有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的古代文化,也拿来预备。苏说:“想不到这种文化史对后来我的屈赋研究颇有帮助,也算是意外的收获。”<sup>[1]</sup>(第 78 页)苏在《屈赋新探》中谈及西亚、埃及、印度神话,与屈赋作品中神话比勘,随手拈来,熟练程度惊人,原因在此。旧派楚学者研究工作所注意的资料和文献,主要是正经正史和历代各家楚辞笺疏。苏则主张“解决屈赋问题应经史子集打成一片”<sup>[4]</sup>(第 20 页)。“所谓经便是五经或十三经;所谓史便是《左传》、《国语》、《国策》及廿四史;所谓子,便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庄子》、《列子》及其他子书,又有汉代一些纬书;所谓集范围更为广大……”<sup>[4]</sup>(第 20 页)。不仅如此,她还宣言,“注解屈原作品,必须利用 7 种资料始可。”<sup>[2]</sup>(第 5 页)这 7 种资

料范围比经史子集又大得多,它们是:

“(一)利用古代神话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吕览》、《庄·列》、《归藏》、《淮南子》、汉代所有纬书及战国秦汉魏晋唐宋以来各种笔记小说,民间传说的神怪故事及不见经典的宗教祀典等。

(二)研究比较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及关于各种宗教的知识,尤须研究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的神话及传说,以与屈赋内容互相比较,藉以追究其真实来源。

(三)涉猎佛经及印度两大史诗,韦陀颂歌、道藏、基督、天方经典,将见此类书藉可与屈赋相印证之处,随处而有。

(四)研究古代各文明民族的天文、历法、地理学说。

(五)参考中国正经如诗、易、书、礼、三传、尔雅等;参考正史及古代稗史,尤须注意今日地底发现之考古资料,足以校正历史事实之错误及补足其缺乏者。

(六)利用音韵学以证战国前后之古音,文字学以考正战国前后之字体,及两者之变迁流衍。于甲骨、铜器等古文尤宜留意。

(七)各家楚辞笺证。”<sup>[2]</sup>(第 5 页)

为什么要利用这些资料?如何利用?她在《屈原与九歌》自序文中作了具体说明。之后,她专门谈了“域外文化”问题,因为这是苏与其他楚辞专家主要不同之处。她郑重指出:“我这部屈赋新探全部建筑在域外文化的问题上。没有域外文化分子,屈原作品即无法阐释,我这部书也就写不成。”<sup>[4]</sup>(第 1 页)又说:“域外文化之来华实有二度,战国尚为第二度。战国学术之成为黄金时代,实外来文化刺激而成。”<sup>[2]</sup>(第 10 页)“屈原曾全盘接受这种域外知识。他的九歌诸神及其故事及《离骚》后半篇遨游昆仑西海诸仙境,固皆由外来,他的《天问》尤为域外文化知识之总汇。”<sup>[2]</sup>(第 10 页)她认为:“二千年来,多逾过江之鲫的楚辞学家,对屈原的《离骚》、《九章》的疏解成绩,还算差强人意,对于《九歌》、《天问》,则不免瞽者猜日,盲人摸象之讥。这也不是为了《九歌》、《天问》的文理过于深奥。其实当中有个原因,也可以说有一道既坚且厚的墙壁,从中阻隔。这道墙若打不通,再过二千年,甚至几个二千年,《九歌》、《天问》给我们的仍然是闷葫芦一个。”“这道厚墙是什么呢?就是屈赋内容多为域外的宗教神话及其他的文化分子。”<sup>[2]</sup>(第 1 页)于是,她决断地指出:历代“楚辞注家对三间本来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屈赋的爱好,也可说如醉如狂,无奈他们为知识所限,笺证如山,始终未窥见屈

赋真面目”<sup>[6]</sup>(第21页)。“这些楚辞学家之所以不能将屈赋内容发掘出来者,最大原因就是不知域外文化这樁大事,域外文化也可称世界文化,这是屈赋的基础,也就是屈赋的生命,你不知道,便就永远被屏于夫子门墙之外,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sup>[6]</sup>(第22页)如此看来,用外来文化解释屈原的作品,应是苏雪林先生独得之秘。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前文讲到武大时期,苏雪林教授开始的屈原研究,是得不到中文系及其它大部分教授的认可与承认的。她发表的有数的几篇论文,除了少数知己朋友阅读欣赏外,实在没有太大的影响。离开武大前,她在学术见解上的知音似乎只有武大化学系张资珙教授一人。苏说:“我到珞珈后,理学院有一位教授叫张资珙,曾留学美国习化学,他说外国化学与中国炼丹术似有关联,若非域外文化传来我国之所致,则我国文化传到域外而使然。他搜集了若干有关资料,听说我也是此道中之一人,引为同调。”<sup>[1]</sup>(第117页)后来来到上海,遇到顾颉刚先生。顾鼓励她加深探讨,庶将来为他的古史辨作答案。似乎又多了一个同调,然而这种研究在中文系老先生中却始终被看做野狐外道,而非正法眼藏。为什么会如此,其中道理我们可以从中文系黄焯教授对学生所讲的一段话中悟出。黄先生是黄季刚的侄子和学生,解放后被称作中文系“五老”之一,他的观点应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汉人之学,咸有师承。后世注文则恁臆说。且兴词隐微难识。果汉人不得其解,遥遥千载后之人,辄时发其神悟,亦甚不近理也。故欲讲明屈赋,但须笃守叔师一家之说,其不可强通者,则以清人之说参之,洪氏补注优于晦翁之集释,可取备观览也”。又说:叔师,“虽立义间有踳驳,要未可以后人之说难之也。”今苏氏不仅不据汉宋及清人的注释来解屈赋,直引“域外之说”加以傅会,不是野狐外道又是什么?然而,苏雪林并不计较这些,她仍不断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且感到武大资料不足。因此想离开武汉,到上海:“因上海华洋汇集之地,资料较为丰富。”<sup>[5]</sup>(第473页)同时认为“屈赋问题既都来自域外,非到外国去一趟不能解决,我将来还是再到法国一趟吧”。<sup>[4]</sup>(第8页)可见,苏很早就有了出国研究的想法。时局的变化,促成她实现了自己的想法,于是1949年后先到上海,又到香港,最后到了巴黎。

是什么使苏雪林不畏艰难,一往无前,孜孜以求呢?应该说是因为她对自己获得的研究方法和路线充满了自信,并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书中她反复叙说,告诉读者:

“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sup>[4]</sup>(第17页)

“近一世纪来,西洋文化的潮流,又冲入中国;连带地,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的古代文化也开始为我们所知。……若能将这些古文化的分子综合起来,使成整个系统,用来解释屈赋,这团乱丝便可以抽出头绪,而屈赋的内容便可以轩然呈露。10余年来笔者便做着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不仅使屈赋内容获得明白正确的解释,而且知道世界几支古文化都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属于世界的一支。并且知道中国文化是个编织极其精密的因陀罗宝网。任掣一线,全网皆动。而屈原作品则牵一发而动全世界。所以我曾说荷马、韦琪尔、但丁、弥尔顿虽然伟大,其时代都已过去,我们的屈原时代则方兴未艾,将放大光明于将来。”<sup>[6]</sup>(第4页)

“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化其实是一种精致坚韧的因陀罗宝网。每根线彼此结连,每个目彼此关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间万物,无不息息相通,脉脉流注,牵一线,触一目,则全网皆合,简直是个有机体的大结构。可惜这宝网上几条主线为了年深日久而折断。全网遂委积于地,成为零乱的一堆,假如有人将那条主线连结起来,则这张网将立刻恢复其以前的形式。这几条主线都存于屈原作品之中,现在我已将它找出,并使这张宝网发挥其奇妙的功能了”。“中国文化这张宝网,不仅贯通了数千年的历史社会,并且将世界几支古文化都包罗其中,竟可说牵一发而动全世界。请问世上哪位文人有屈原伟大?哪种文学有屈赋这样的关系重要?”<sup>[2]</sup>(第18页)

“我这部《屈赋新探》一百三四十万字(今4集出齐,共160万字),彼此贯通,一线到底,绝无穿凿附会,矫揉造作之嫌,可说是世间最自然的考证”。“彼此贯通,一线到底”8个字是值得注意的。我对这个研究之敢于自信,也就在这8个大字上。”“全书小小错误,自认难免,原则则不可推翻。”

今天读着这些话,我们不得不对苏先生的见解、毅力、信心产生感佩,人生中果有一刻达到这般自信,而其意义又如此重大,真可谓到这个世界来不虚此一行行了。

苏先生的自信决非凿空之论,是建立在她的对世界文化的理性认识和因不懈工作而获得的几百条证据上。

她说:屈原“《九歌》诸神及其故事及《离骚》后半遨游昆仑、西海诸仙境,固皆由外来,她的《天问》尤

为域外文化知识之总汇。这些话都不是凿空之谈,读了我的《屈赋新探》,不承认也得承认”<sup>[2]</sup>(第 10 页)。“今若谓屈赋及战国古籍之所言,与异域文化分子相符者,不过‘偶同’、‘暗合’,两者并无真正关系,则笔者亦未能心服。……‘偶同’、‘暗合’之事,仅能一二,至多六七而已。现在我在屈赋及先秦古籍里所发掘者大小凡数百证,尚强谓为‘偶同’、‘暗合’,则似乎说不过去吧!(参看苏《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一文)”<sup>[2]</sup>(第 14 页),“英法各国神话家讨论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神话,谓其与埃及、希腊、印度甚多相通之处,初亦认为‘偶同’、‘暗合’,近则言此数支文化来源于西亚者日益众多,想不久或可成为定论”<sup>[2]</sup>(第 16 页)。

苏氏的“域外说”是建立在所谓的“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的理论上的。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一文中苏雪林说:“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的一支。我这发现为时甚早。民国 33 年在四川乐山写昆仑之谜的时候,便把这个理论在该书的余论里宣布出来了。”<sup>[3]</sup>(第 187 页)在《屈赋论丛》自序中又说:“据我屈赋的研究,世界几支古文化象西亚、埃及、沿地中海国家、希伯来、希腊、印度及我们中国的宗教神话面目虽异,精神则同,种族虽殊,血源相近,谓其同出一源,我想谁也没法否认。”她还进一步指出:“文化之为物,不能独自发展,原始文化必须与较高文化合在一起,彼此感染启发,激荡融汇,而后始能形成一个高级的文化。”<sup>[2]</sup>(第 13 页)她对屈赋作品作剖析,说明这一见解。她分析说:“文学的演进如一切生物之演进,有其一定的程序。若遇外界重大刺激和特殊天才的诞生,则文学的进步呈出跳跃的姿态,有一跳而跳过数世纪者。但屈原作品的出现,则那阶段中国文学进步之快,快得未免有些不近情理了。盖在他以前,中国文学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屈原作品结构如此之齐整,篇幅如此之恢宏,辞藻如此之富丽,情操是如此之优美,命意是如此之高超,《诗经》里那些篇章同它一比,竟有云泥之别,这已很使人纳闷,它的内容则尤其奇怪,不但汉宋时无人能解,直到现代,还是文学界一个讨论的焦点,学术界一个研究的中心……虽说他天才卓绝,也未必能卓绝到这样地步。但若说他所以如此,乃由于外来文化影响,则解释便自不同。”<sup>[5]</sup>(第 465 页)“当纪元前 3 世纪顷,即战国中世,亦即屈原时代,希腊、波斯、西亚、印度文化大规模地传入我国……。造成了中国古史上黄金时代的战国文化。当时传入者,……文学艺术也传入不少,神话尤其大部分,而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者,则为屈原全部作品……。”<sup>[5]</sup>(第 464 页)苏用她

世界文化同源的理论具体分析屈原作品的特异情况,应该说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

苏雪林在《屈赋新探》中所走域外说这条与众不同的路线,可说是既新颖又前无古人的,然而赞同者不多,而怀疑或反对者甚夥。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新的发现,一个新的论点,从来不会立刻为众多的人所理解和承认。苏对大多数摇首而不予置信的人提出的怀疑理由,亦充分估计,并作了辨释说服工作。此在《屈原与九歌》自序中有详细论述。故不赘,仅就其中一条摘引如下,以见其说服力:

“或问:域外文化思潮既在我国波澜开阖,蔚成奇观,何以仅喧阗于一时,秦以后便光沈响绝,以致班、马、杨、刘对《天问》竟有不能读悉之叹,历代楚辞注家也聚讼纷纭,始终摸不着它的真正意义?”苏先生辨析说:“文化之为物乃人类思想之产品,必须加以人力之维持,始能延续其统绪而不坠。若文化系由外来,非我固有者,则稍一疏忽,便付淡忘。战国外来文化之灭亡,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始皇所坑方士盖研究域外文化之人,方字与人方鬼方之方同义。)秦末天下汹汹,刘项五六年大战,及汉初 10 余年间挟书之禁,是有很大关系的。……战国传来之域外文化,植根本来不深,忽遭政治上之大力摧残,其归于萎落,又复何怪?但谓其完全萎落,则亦未必,一部《淮南鸿烈》所蕴域外文化之分子便极为丰富,武帝好神仙,齐燕间方士又渐形活跃,所谓齐燕,盖即战国时外国学者税驾之所。因他们曾授徒讲学,所以方士独盛此二地,其余绪衍为纬书……”。苏先生设为问答,辨难析疑,极有分寸,使人不得不信。

据苏先生自己说:她的关于楚辞屈赋的文章发表以来,从未引起读书界的反响。而她自己对其研究成果则是极为重视的,似乎看得比她生命还显得重要。她曾说:“1948 年冬,政局日益紧张,家人苦劝暂避。……这一条饱经忧患的微命,断送诚不足惜,但屈赋研究,十仅得一,矢志入地,实所不甘。”<sup>[5]</sup>(第 473 页)“及战局稍定,感到乱世生命之无保障,草木同腐之非素志,发愤再从事屈赋的探讨。”<sup>[5]</sup>(第 473 页)如今她的屈赋研究早已完成,且全部出版问世。但由于海峡两岸隔绝的原因,大陆方面还很难见到其全部著作,其《屈赋新探》4 大册,更不易觅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苏雪林文集》,只选了部分学术论文),在这种条件下欲研究其学说诚非易事。可能因此缘故,大陆对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成果作系统全面探讨者至今不多。笔者只见到著名楚辞专家萧兵先生在其《楚辞的文化破译》大著中谈《天问》时提到:“她的《屈赋新探》4 书,尤其是《天问正简》处处

以巴比伦、印度、希腊神话比附《楚辞》的内容，常常弄得捉襟见肘，杂乱不堪（尽管有一些具体的‘比较’可以批判地采纳）。这也可以说是对于《天问》的极大误解。”萧先生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是否有肯定的呢？因笔者受见闻所限，至今未见到。对苏先生的屈赋研究发现的新方法新路线究竟是应肯定，还是否定，因兹事体大，涉及人类学、文化学诸重大问题，笔者实不敢遽下结论。但读苏先生书，对其将毕生心血献给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作出的成果和贡献，对苏先生的治学魄力、毅力、勇气、信念以及服从真理的精神是无限钦佩和敬仰的。笔者认为，苏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苏先生的执著的追求以及服从真理的精神。苏先生说：“我于无意之间发现探讨屈赋的新路线，兴奋之情变成白热燃烧的状态，对于这个研究简直爱得如醉如痴……。”<sup>[3]</sup>（第418页）且看苏先生叙说自己在研究屈赋中浑然忘我的情境的一段话：

“我整个身心沉浸在这项灵感里，足足有10天之久。彼时胃口完全失去，睡眠时身虽偃息在床，心灵则清清醒醒，我的一颗心像一颗晶莹透彻的大珠宝，发射出闪烁的光芒，彻照我灵台方寸之地，不，竟可说彻照了中国几千年的故纸堆，一直照到巴比伦、亚述、埃及、波斯、印度、希腊等国的古代史……，那时我的智力活动达于最高峰，好像佛家所说，一个过来人游历前身曾游之境，当其宿因顿悟，便一切恍然，某送阅某房，叩关直入，毫无疑误；也好像当年屈大夫的英灵，降临到我身边，冥冥中指点着我。他打着光明的火炬在前引导，我的心灵，则上天下地跟着他到处飞翔。我的目标尚在几千丈的高峰之上哩，我并不必逐级攀登，却从空直落。我的目标尚在几万里之外哩，也不必渡水登山，按驿前进，只需振翅一飞，便飞过前头去了。”<sup>[1]</sup>（第106页）

当我们读到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动不已，苏先生的生命已与学术研究合为一体了。

更可贵之处是苏先生寻求真理的勇气。苏先生为了给楚辞、屈赋的研究寻找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方法，创立了“域外文化”说，一时间议论纷纷，各种反对论调涌现。面对这一切，苏先生态度是：“论断事物以真理为依归。”<sup>[4]</sup>（第13页）她说：“寻找真理，必须屏除感情，摆脱私见，掉臂独往，六亲不认，稍有牵挂，真理之门就不为他开启了。”<sup>[4]</sup>（第11页）当然她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真理。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既有自信，也非常理性，在《写在屈原与九歌出版之后》一文中说：“一部著作总不免错误罅漏之处，希望读者提出指教，以便将来改正。若能提出确实而

坚强的证据，说我的大前提或中心思想也完全是错误的，则我愿把180万字的稿子一火焚之而不惜！”<sup>[4]</sup>（第381页）这对一个毕生献给学术为学术而奋斗的人来说，是何等的大气魄，大勇敢啊！

平心而论，苏在学术研究上是作出了贡献的。这个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发现”了屈赋中域外文化的分子。对此苏先生有自知之明，她说：“我以为考证之事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发现，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是发明，要费许多心力。发现云者，那考证的对象，万千年来便静静地躺在那里，以有所隐蔽，不为人见，若有眼明手快的人，将它一把揪将出来，它也就显现众目之下，无所遁形了。……我没有那么大聪明大学问做发明工作，只好做碰运气，享现成的发现工作。”<sup>[2]</sup>（第18页）

发现“世界文化同出一源”，重新建构屈赋中诸神世界，并找出了楚辞、屈赋研究的新路线，这就是我们给苏雪林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贡献的定位。至于“域外文化”能否成立，确如雷永明《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序文中所说的“必须查考历史，穷究民族学，检讨宗教比较学、语言学等等，然后方可得一完善牢固的结论，令人中心信服”。而这一工作只有留待来者不断研究、探寻了。

#### 四、余 意

最后，笔者需要贡献的一点体会是：许多读者和学术同仁和我一样，原以为苏先生是“五四”新文学后重要的女作家，她的散文之美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学术考据文字，难免有枯燥生涩之感。实际并非如此。笔者阅读了她的《屈赋新探》4册后，感到她的学术论文与那些艰深奥曲的论文不同，不仅文字显浅通俗，而且所有证据，都像信手拈来，不费半毫气力，尤其读时感到她不仅擅长发现前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索隐钩沉，解决悬而未决的疑案，且娓娓道来，极为生动引人，就像说故事一般。简直可以说她已将枯涩的学术文章写成了如同散文一样优美的文字。谓余不信，请抄录下面一段美文与诸君共赏：

“离骚辞采之瑰丽，命意之奇警，情感之热烈，气象之壮阔，境界之复远，……实为绝后空前之作。后半篇漫游仙境，求婚神女，及远赴西海诸端，幻想力之丰富，想象力之超卓，更令人震惊。……说者谓《离骚》实可与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鼎足而三……但神曲乐园，篇章繁浩，《离骚》则仅2400余字，竟能包括如许的故事，含蕴如许的意义。好像一座崇山，千岩万壑，移步换形，在在引人入胜。好像无边大海，波澜开阖，鱼龙动荡，处处骇人心魄。好像一

座精工刺绣的锦衣,花鸟天成,五色辉映,刀尺之匀称,针缕之绵密,非针神不能胜任。好像罗门的宝藏,明珠翠玉,火齐木难,靡无不有,探之无尽,取之不绝。以极简单,极精练的文字,阐释深奥的哲理,综括繁多的事实,原属中国文学的特色,现在屈原的《离骚》把这个特色,予以充分的发挥,简直奇迹化了,我们有了这样伟大的作品,能说不是最大的光荣么!”(《离骚的神话人物与神话地理》)<sup>[6]</sup>(第 221 页)

这哪里是写学术论文,简直就是一首词采华丽、妙譬如珠的散文诗。其细腻处如潭光湖影,涟漪荡漾;其浩瀚处,则为黄河长江,一泻千里。无论从学术上看,还是从文学角度上评论,苏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煌煌《楚辞新探》巨著,不折不扣是学术与文坛的一朵奇葩!

### [参 考 文 献]

- [1] 苏雪林. 苏雪林自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2] 苏雪林. 屈赋新探:第 1 集屈原与九歌[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 [3] 沈 晖. 苏雪林文集:1—4 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4] 苏雪林. 屈赋新探:第 4 集屈赋论丛[M]. 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
- [5] 苏雪林. 屈赋新探:第 2 集天问正简[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 [6] 苏雪林. 屈赋新探:第 3 集楚骚新诂[M]. 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

(责任编辑 何良昊)

## SU Xue-lin, Wuhan University, *QU Yuan's Rhyme Prose*

WANG Qing-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Qing-yuan (1941-),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bstract:** SU Xue-lin (1897—1999) is a great master of both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who taught for eighteen years at Wuhan University. She began to study *QU Yuan's rhyme prose* at Wuhan University and finished her research in Taiwan, with a bumper harvest. *A New Study of QU Yuan's Rhyme Prose*, her masterpiece, is a wonderful work of academic stature. To research the Chu Songs, she took a special wa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en senior scholars. Su's unique secret of success is to use the foreign cultures to decode QU Yuan and his works, so she found the same origin of the word cultures, reconstructed the gods' world in *QU Yuan's rhyme prose*, and opened a new route of the relative researches. This is the position we have fixed for SU, a brilliant example for us.

**Key words:** SU Xue-lin; Wuhan University; alien cultures